二十年代的中國女醫師

楊步偉

太平天國洪楊之亂平定後，南京慢慢恢復往昔的繁榮，光緒十五年南京花牌樓一所一百二十八間的房子裏，一個女孩子悄悄出生了。十九年後，她寫了一封退婚信，把長輩定的指腹婚約解除；此時，她的朋友林貫虹在日本替她申請加入了同盟會。二十歲還沒入大學時就當了崇實學校的校長，後來東渡日本學醫濟世，而後不經任何結婚儀式就與哈佛大學哲學博士、名語言學家趙元任結婚了。以下是楊步偉醫師自述的學醫生活和開業生涯。



一、學醫生活

一九一三年陳其美、柏文蔚、李烈鈞等發動二次革命討伐袁世凱，當時南京的革命軍漸呈敗勢，柏文蔚勸我把崇實學校解散，於是隔天就解散學生退到上海，又過五天革命軍一敗塗地，也都到了上海。當晚柏文蔚給我三千六百元要我到日本留學，並託我帶他父親、二弟、妻子到日本長崎，我在患難中義不容辭地承擔了這個責任。到了東京後，因恐錢不足我就拼命的學日文，兩樣並行，可以早點考入女醫學校。因爲中國政府規定凡考上五大學校的，政府一定給官費，中國政府在那時候派的中央監督住在東京，只要入了學，就可以直接去請官費，我從十月起學日文，到第二年四月就正式考入學校了。然後又開始補習德文，因爲在日本學醫，名詞都是用德、日、漢、拉丁文四種，所以就以一身二百多塊骨頭來算，也須記一千多個名詞。

我讀完了上學期就回國一趟，父親見到我歡喜的不得了，我到家時不過才「讀完」生理解剖等等的理論，還不知醫病，可是我父親逢人總說醫生來了。父親總問我將來願學那一科，在什麼地方開醫院，他好替我準備，又常對人說，我有一個女兒勝十個兒子。可是我一生並未做出對國家與社會大有用的事，負了我父親的希望，所以我現在不贊成女兒們學醫除非不嫁才可以。我第二個女兒想學醫，我告訴她，除非不嫁，否則花那麼多時間和金錢學醫，却不能做什麼，豈不浪費。她說她就不嫁好了。我說妳長的太美了，若是不嫁豈不是暴殄天物嗎？她以後學了化學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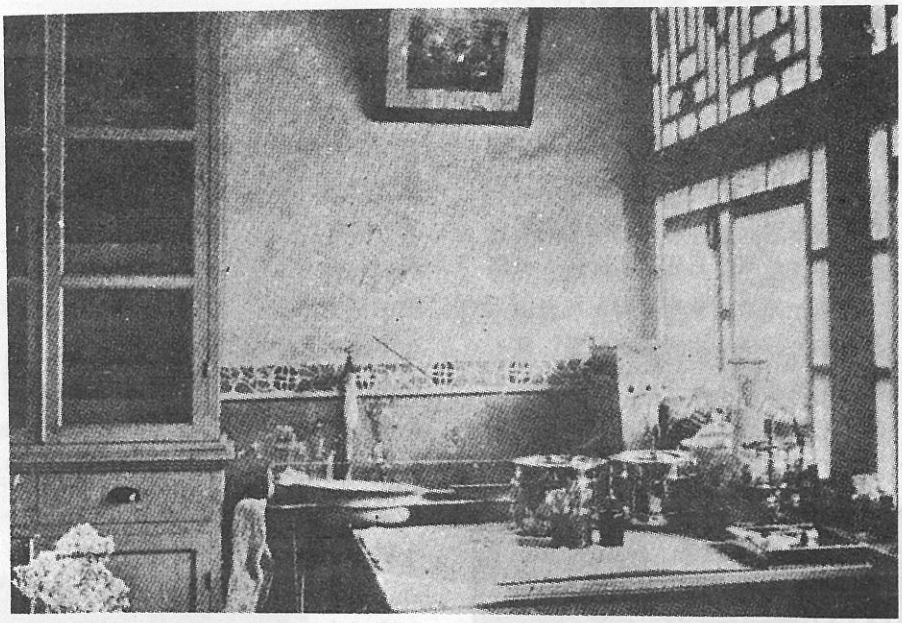
在日本讀書期間，和日本人接觸眞是使人可氣又可恨。先說工作習慣的不同，他們和我們對於上課方面有一種最不同的地方，就是日本學生不管如何，人人都低下頭來拼命的寫，教授說什麼，他們就寫什麼，連與功課無關的也照抄不誤，眼也不看先生，只低著頭快寫而已。這是因爲醫學書籍很貴，不可能人人有，又無好圖書館，所以全靠講義才行。中國學生因爲寫不了那麼快，又差不多人人仰著頭望著教授聽講，遇重點時才用筆記下來。我一班內十四個中國學生也有三四個人是照他們辦法，可是趕不上，下課時只好借他們的筆記補抄起來。可是日本人的人情很薄，你這次借用他們的筆記，就得趕快還他的人情，否則下次你休想再向他借了。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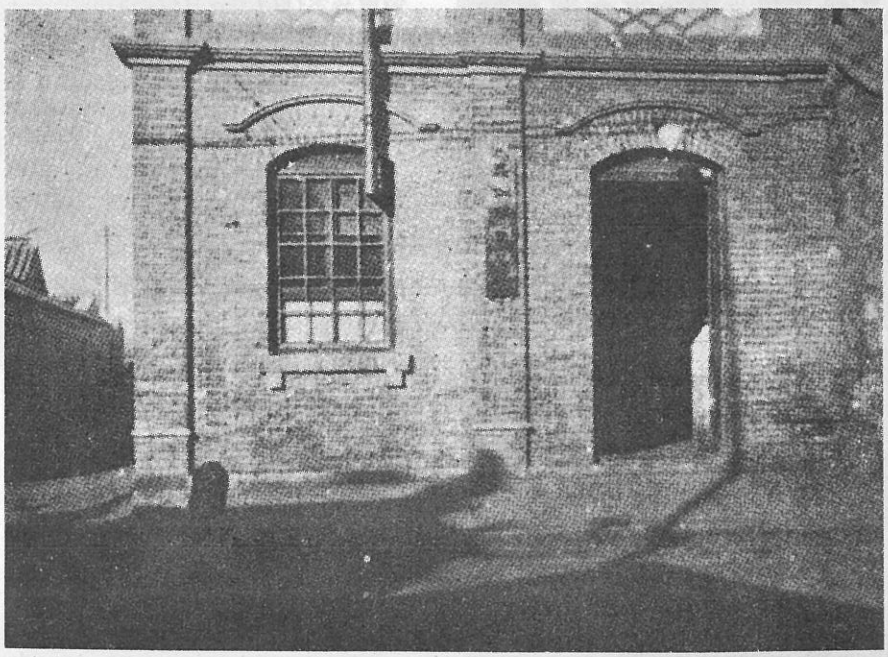
試時，也是這樣，一張試卷寫得滿滿的，就像一本書似的。我寫的少也有少的好處。我考衞生學時，教授在考試後宣佈有一位中國學生寫的答案又簡單又明瞭，你們大家應該拿她做榜樣。然後把我的三張考卷放在桌子上讓大家傳觀。

有一樣最欺人的就是解剖實習的編派，一個屍體是歸四、五個人解剖，找肌肉、神經、血管等等，由同班領頭人分派，他不給中國人照字母分派，卻將中國人全體派到最後，那時已近暑假了，屍體臭的不得了，因爲都是死後兩天的人送來作解剖，不是像美國人將屍體用藥泡過後才給解剖的。有時候還給我們患顆粒性結核的屍體。我們一班共十四個中國人分成五班，每班三個中國人一個日本人，每次被派來與我們中國人同班的日本人，總是大吵大叫說爲何派他跟我們一道？且解剖時這個日本人總不動而在旁邊看著，問這個問那個的。一次二次我們動起疑心了，想日本人向來對事不讓人的，就是有臭味他們也是做的，爲何這幾個人如此？並且我們把神經血管找到時，他就拿一本書用一個鉗子夾著來慢慢和書上對照，沒過多久就去洗一次手消毒。我們就覺得奇怪？起初還以爲他們派不中用的日本人和我們一道，直到有一次不按字母派一個許姓高麗人來，才把事情鬧穿了。原來這個姓許是住在日本人宿舍裏的，和一個姓許的中國學生認本家，兩個人很要好，同用書同玩，一齊進出。日本同學都妒忌他們。那次他被分派到，因而大鬧，一直鬧到監學那兒，監學出來說公平話，把班長叫來罵了一頓，我們才知道用有病原的屍體做生理解剖是犯法的。

在日本學醫的本來要到第四年才能實習醫人，我和同學李貫中在第三年就特別交涉到日本帝國大學去實習了。以後派在帝大的附屬三井醫院裏，每星期兩個下午在名科輪流的看和診斷。我們在外科、內科和心臟科特別的學，心臟科主任吳博士對我們兩個人很好，凡是有特別定形的心臟病人，都臨時打發人叫我們去看，或者花半點鐘讓我們去慢慢診斷，說給我們聽。我自己對內科傳染病最有興趣，可是監督處通知說政府已命令凡是女學生學醫的一概學婦產科。因此我只得改科，可是在四年內並不分專科，各門都要讀的。在畢業考時有一位松井教授硬要加分數給我，那是在考眼科時，得要配近視、散光等等各種眼鏡，我那時忙著做盲腸手術、實習婦產科等，覺得眼科懂了就夠了，所以我答考卷時候，自認差不多及格就交卷了。可是松井教授一看就叫我說，楊樣！楊樣！妳一定能答的比這個好一點，我知道妳能夠的。我還記得是在那個走馬樓閣子上，我走在前頭，松井教授就在後頭拿著一本卷子追著我叫，一隻手還拿著一盒眼鏡片子要我配。這是我最後一次自己動手弄眼鏡片子。

一九一九年五月，我父親來信要





第十二圖　森仁醫院大門

我在八九月回國組織醫院，他特別到北京準備買房子造醫院，等我回國。不料，我父親到了北京只兩天就病倒，不久即逝世了。我當時雖然傷心極了，但想父親已死，再等一年回國也可以，因我的官費還有一年，可多學一點。但是家人一再催我回國，貫中也催我回國，她說她也願意和我這時同回國開醫院。所以四天後，我們即動身返國。

二、開業生涯

我們辦的醫院命名爲森仁醫院，醫院開張後病人非常多，大部份都是政府各部的人員和家眷，我們雖然只定收婦產科和小兒科，可是人託人都來了。當時女醫生很少，若有也都是教會的。而忽然來了兩個青年的中國女醫生，而又獨立開了一個醫院，誰都願意來看看。北京城內因而哄動一時，聽說是兩位年輕小姐開的，無病的也花一元掛個號來看看，或者由人託人的來拜望。中國的事就是這樣，你不能說我們定好了診察時間一切人來都恕不招待，而且剛開始辦個事業，更須要衆人知道才能開創出去。也不能像美國廣告式的宣傳方法做各種事業的宣傳，而中國主要是靠人與人往來上的宣傳，所以只好一一招待他們，結果弄得一天到晚客人比病人多。



中國還有一個風氣，生意不照生意做。熟人來看病的，你不能照規矩開賬，而病人也不願照賬付，情願送禮或請酒，花的錢比照規矩付的錢還多；再不然你給他治好了，他們醫藥費不給，可是用一大筆錢叫花子隊的吹鼓手大吹大打的送一塊匾來掛上，以爲這是最恭敬的給你宣傳品，可以使別人相信你的醫術。結果我們領情不得實惠外，還要自己花不少錢去開發酒錢。總歸一句話得其名而不得其實而已。那時北京協和醫院還沒有擴充，在預王府新造的醫院還未建造成功，而我們又是中國女子自己開的，所以一般人非常的歡迎。可是也有危險的地方，因爲我們一個年輕的女醫生不比男醫生，所以每次出診我總帶一個男聽差和兩個女看護一同去。有時半夜三更忽然來一個電話請往診就得去，也不知是何種人家，只得提心吊膽的去出診。有一次最使我害怕的，就是在南苑的一個吳團長，在天亮五點鐘的時候，忽然派了一輛汽車四個憲兵來打門，並且打的急的不得了。看門的開門一看嚇了一跳，叫著進來說，不好了，憲兵司令部來捉人了！一叫把我吵醒了，我一想那幾天我並沒有診治過危險的病人，不會出錯事。我告訴聽差的，叫他們在招待室內等一等，我馬上出來。他們還是催的不得了，聽差的因嚇的緣故也聽不清他們說什麼，只知道叫我快去。我一面穿衣，往前走，一面偷偷的叫看護婦到隔壁去叫一個警察來，一同去問他們。我們醫院旁邊就是一個警察分局，日夜有巡警在裏面，醫院有一個旁門就靠在他們窗戶邊，所以他們一聽見就從旁門進來了。我正等著一道出去，見憲兵問有什麼事？憲兵一看見我有警察跟著，大笑起來了，說他們不是辦差，是來請楊大夫看病的。他們吳團長久仰楊大夫是國手，所以他們太太昨天夜裏一病就打發他們來請，特別從師長那兒借了汽車來的。我就問他們太太什麼病，他們也說不上來。不過我想做此官行此禮，不能說不去，就匆促地洗了一個臉，帶了兩個看護婦又帶了一個警察一共八個人，就到南苑去，並交代李大夫若是多少時候不回來，就告訴區裏查有沒有吳團長這個人。我現在只得冒險去好了。到了南苑在營房旁邊一所房子大門前停下，我放下心了。進去後吳團長親自出來接我，進去一看他的太太睡在床上，我去診查過後一點毛病也沒有，只是胃裏瓦斯膨脹而已。又有了五個月的身孕，我的意思是吃點藥就可以了，他們非要打針不可，認爲打針好的快。這也是在中國行醫的一個怪現象，有的地方是要依從病人方面的要求，等到他相信你以後，你說什麼他都聽了。我當時只得給他打了一針，一下就睡了。吳團長還不放心叫我走，又拿出早飯來陪我吃。半點鐘後這位太太醒了，說好了，馬上出來對我又是作揖，又是鞠躬，說這簡直是神仙，眞是手到病除，過幾天要送匾來。我眞又好氣又好笑。我告訴她，妳今天早上嚇了我一大跳，不知是我犯了罪，還是你們是綁票的呢！大家笑一陣，又用汽車送我回家。過了一個星期又請我到飯館吃酒席，二桌客人，恭維的我不得了。等了一個星期又送匾和兩抬箱禮物，結果我花了十幾塊錢的賞錢，他可沒有付我一個錢的醫藥費。車夫看護婦他們倒賞了二十元。所以我總說，生意茂盛，本錢乾淨。